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September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安全理事会第 2664(2022)号决议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664(2022)号决议第 7 段提交，其中安理会要求秘书长就安理会采取的制裁措施的意外负面人道后果提出书面报告。这些措施包括旅行禁令和军火禁运措施以及特定制裁制度的特有措施。安理会还要求本报告中提出关于如何尽可能减少和减轻制裁的这种意外负面人道后果，包括为此颁布更多关于此类措施的长期豁免的建议。

2.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其《2023 年全球人道主义概览》中报告，2023 年有 3.39 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实施了联合国制裁措施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有关个人、团体和实体被实施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措施的国家，该委员会是针对两大恐怖主义团体采取定向措施的全球制度。该厅指出，所有这些国家占 2023 年人道主义呼吁总数的 67%(截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包括 10 个最大的机构间协调人道主义呼吁中的 7 个。

3. 制裁措施经常在高度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中实施，这些环境的特点是长期冲突、长期不安全以及经济和治理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因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而加剧。在这种环境下，人道主义行为体往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制裁可能会直接通过制裁措施本身，或间接通过人道主义交付链中的各种行为体，如有义务执行安理会制裁措施的国家、捐助方、国际供应商和金融部门行为体的过度遵守(超出法律必要的遵守)或去风险(消除或避免风险的行为，而不是管理风险)，给人道主义应急行动带来额外挑战。人道主义行动面临的挑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全归咎于联合国的制裁，这很难衡量，因为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会员国或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单方面实施的制裁。



4. 本报告审查了联合国制裁可能会如何对人道主义行动造成意外负面后果，包括制裁对人道主义组织按照人道主义原则提供援助的能力、与人道主义组织合作的私营部门公司和银行、捐助方的做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对受到制裁的会员国的影响。报告还审查了受制裁个人或实体在人道主义应急行动中可能获得的附带收益，以及为尽量减少这些负面影响而实施的风险管理和尽职调查程序。总体而言，报告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审议联合国制裁措施对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的影响，以及安全理事会、会员国、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消除这些影响而采取的缓解措施。

5. 本报告以联合国系统(主要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以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汇编的资料为基础。本报告还载有与支持安全理事会各制裁委员会的专家小组和专家组以及人道主义机构进行协商期间获得的资料，以及来自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其他相关来源的信息。

二. 联合国制裁框架

6. 安全理事会实施制裁是为了行使其第七章授权，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指认个人接受资产冻结、旅行禁令或其他措施是安理会的预防行动，旨在改变行为，例如支持和平过渡，遏制暴力，打击恐怖主义，保护人权，遏制违宪更换政府或促进不扩散。

7. 建立联合国制裁制度需要设立一个由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组成的制裁委员会，其总体任务是监督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就关于制裁措施豁免的通知和请求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以及指认符合相关决议所载列名标准的个人和实体。为促进执行制裁措施，制裁委员会可发布执行援助通知，指导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履行安理会决议规定的义务。安理会还经常设立支持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组(常称为专家小组或专家组)。

8. 自 1966 年在南罗得西亚首次实施制裁以来，联合国制裁机制经历了重大转变，随后又建立了若干其他全面制裁制度。例如在伊拉克，1990 年开始的联合国的全面制裁限制了贸易，严重影响平民，造成了苦难并致使婴幼儿死亡率上升。为此，安全理事会限制使用全面制裁，并在 2003 年引入了更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减少意外的人道后果。自 2004 年以来，联合国的所有制裁制度都包括限制性措施和定向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有限、战略性地关注某些个人、实体、团体或企业。

9. 截至 2023 年 9 月 1 日，安全理事会设立了 31 个制裁制度，其中 14 个仍然有效，分别针对基地组织、青年党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中非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海地、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南苏丹、苏丹、也门和塔利班。安理会一再强调，制裁措施无意给平民带来负面人道后果。这一原则在有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制度的决议以及有关对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利比亚、马里、南苏丹以及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制裁制度的决议中得到重申。然而，

尽管有这一长期原则，并且联合国定向制裁在支持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有时也会产生意外负面人道后果。

三. 联合国制裁与人道主义活动

A. 联合国制裁措施的预期影响

10. 虽然对联合国制裁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辩论，但联合国定向制裁在许多情况下最终会制约负面行为，并促使各方表示支持国际规范框架。根据学术研究，利用制裁来影响当事方的行为有时被证明是有效的，包括在安哥拉、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制裁威胁是一些武装团体释放儿童的决定性因素。在南苏丹，制裁促进通过了禁止性暴力的军事命令，并促进释放受士兵虐待的妇女。在联合国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一些人道主义组织承认联合国制裁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并(通过制裁问题专家组的报告)提高具体人道主义问题的知名度。

11. 安全理事会还通过了旨在积极促进人道主义标准的制裁标准。关于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南苏丹、苏丹、也门、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青年党的八个现行联合国制裁制度规定了与保护有关的列名标准，包括针对犯有以下罪行的犯罪人的列名标准：性暴力；对平民、人道主义行为体和资产进行袭击；阻碍人道准入。根据这些标准对一些个人和实体进行了指认，包括与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也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

12. 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已采用列名标准来制约妨碍人道主义行动的个人。在马里，制裁委员会于 2019 年 7 月将一名个人列入名单，原因是他的行为阻碍人道准入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交付，并损害合法的地方当局作为人道主义组织协调中心的作用(因此也威胁到和平协议的执行)。在他被指认后，此人被解除职务。这一列名说明了联合国制裁措施如何被用来支持人道主义应急行动和保护人道主义空间。

B. 联合国制裁对人道主义活动的意外负面影响

13. 联合国制裁措施为参与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的联合国实体规定了直接义务，要求它们在开展行动时确保不直接或间接向安全理事会指认的行为体或为其利益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违反这一义务的风险在一些情况下为参与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的联合国实体、其合作伙伴和服务提供者制造了障碍。

14. 遵守制裁措施的复杂性因实施联合国制裁措施的各种国内立法的通过而变得更加复杂，非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在法律上有义务遵守这些立法。一些管辖区将执行联合国制裁的措施扩大到它们单方面指认的行为体，而这些行为体不是安全理事会指认的。在某些情况下，除安理会制裁措施外，还适用与安理会相关制裁制度规定的措施不同的限制性措施。由于联合国制裁措施一般不是在真空中实施或执行的，而是与其他政策、经济和法律因素相互作用，如单方面制裁或国内立法，限制性措施的复杂重叠使得很难将具体类型的影响完全归因

于联合国制裁措施。有害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至少部分归因于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仍不确定。例如，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报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对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产生了尤其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获得食物和保健方面。不过，专家小组同样指出，很难将联合国制裁措施与其他因素分开(见 S/2022/668)。

对人道主义活动的限制

15. 根据几项研究，在多个人道主义背景下，由于担心违反包括联合国制裁在内的制裁措施(同时也担心被指为不遵守制裁措施)，人道主义活动受到限制。根据学术研究，索马里的几个人道主义行为体报告说，担心违反制裁措施或失去供资(以防他们的活动会间接给联合国指认的行为体带来附带收益)往往导致与特定个人或团体接触以及在某些地区开展行动的意愿下降。据报告，在过去 10 年中，类似的影响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中东、大湖区、阿富汗和其他地方。

16. 在某些情况下，要促进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意味着要与联合国制裁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在一些地区，这些行为体拥有有效的控制权，充当事实上的权力机构，行使政府职能，如控制公安部门和一些机构，或控制进入这些地区、在这些地区内通行或通过渠道。在向居住在此类行为体控制地区的社区提供援助时，人道主义行为体可能会由于别无选择，需要获得与联合国制裁的行为体有间接联系或受此类行为体事实管辖的当地供应商的服务。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与公用事业、运输、汇款和/或安保实体相关的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在实施人道主义方案时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听从联合国制裁的行为体指令的机构，以所需的规模和紧迫性向弱势群体提供援助。例如，阿富汗境内的人道主义行为体不得不向某些公营公司支付公用事业费，这些公司向可能受控于受制裁个人的事实上的部委汇报。也是在阿富汗，当地承包商必须向事实上的当局纳税，而事实上的当局也代表名单所列人员或作为名单所列团体的平民代表行事。

行政负担和延误

17. 军火禁运的目的是作为一项预防冲突措施，防止向政府或武装团体进出口武器。它还会对人道主义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阻碍了具有双重用途的物品(例如，既可用于民用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的物品和技术)的进口。例如，排雷和现场处置战争遗留爆炸物所必需的设备(如炸药和雷管)可能会受到军火禁运。虽然可以向相关地雷行为体提供豁免，但这一过程非常耗时，可能会延误人道主义排雷活动。由于现有的军火禁运，保护人道主义行为体所需的其他两用物品，如防护服和非致命性军事装备，在采购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审查。国际供应商经常要求提供更多关于货物和物品最终目的地的信息，特别是两用物品、医疗用品和新技术。

18.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出口人道主义组织在该国开展业务所需的一系列物品之前，必须获得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特别授权，这一要求据报造成了重大的行政负担和延误，对这些活动造成了影响。这

些物品包括卫生或生殖健康工具包中的金属、化肥、某些类型的医疗和电信设备以及水卫生设备。

19. 人道主义组织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资金的能力继续受到安全理事会对该国金融部门实施的部门限制的影响。安理会禁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外国金融机构维持任何代理银行关系(见第 2270(2016)号决议第 33 段), 除非经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逐案批准, 这使得人道主义组织等机构难以找到能够或愿意与当地工作人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金融交易的金融机构。在没有银行渠道的情况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道主义组织不得不把实体现金带进该国, 这增加了风险。在有关会员国和金融机构的协助下,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继续努力重建持久和高效的银行渠道, 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提供资金, 并探索临时解决方案。

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援助交付链中的过度遵守和去风险行为

20. 人道主义行为体所描述并反映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关切是人道主义行为体、银行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过度遵守。在这种情况下, 人道主义行为体可能选择不与某个人或实体接触, 因为担心这种互动会导致法律、财务或声誉风险。这种关切可能来自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实体。在这方面, 秘书处可酌情扭转这一潜在普遍现象, 提高对过度遵守和去风险的意外负面人道后果的认识。

21. 在许多情况下, 人道主义行动都出现了过度遵守和去风险的情况。一些区域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报告说, 担心违反制裁, 包括联合国的制裁。除人道主义组织外, 各利益攸关方也参与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包括捐助机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援助交付链中的利益攸关方可能会参与过度遵守或去风险活动, 以尽量减少它们在受制裁行为体开展行动的国家境内进行与人道主义组织活动有关的交易所面临的法律、财务和声誉风险。

22. 例如, 由于担心违反联合国制裁措施或其他条例, 银行和汇款操作方拒绝或突然停止向人道主义组织在某些国家的行动提供服务。在索马里和阿富汗, 采用被称为人道主义例外做法的长期豁免证明是在正规金融部门内维持人道主义行动有限的资金命脉的必要条件。2010 年在索马里采取了这种例外做法, 引发了国内一级的行动, 包括政府当局、银行和人道主义组织之间的对话, 事实证明这种对话是有效的, 因为被搁置数周的交易在数天内就被解锁。同样, 在阿富汗, 安全理事会第 2615(2021)号决议的通过使人道主义组织能够在该国获得有限的资金, 尽管这些资金仍需要得到联合国现金机制的补充才能充分支持人道主义行动。

23. 为了尽量减少人道主义资金可能最终使联合国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或实体受益的风险, 资助人道主义行动的捐助机构同样也可能参与监测和去风险活动, 其中一些活动会转给受援组织。例如, 一些捐助方可能要求潜在受赠方在援助被挪用风险较高的领域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小组, 这导致间接费用, 降低了方案预算中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直接援助的比例。一些人道主义组织报告指出, 捐

助方一直不愿为当地的国际人道法培训提供资金，因为这是一种与使用军火有关的培训形式，因此它们认为这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军火禁运规定。银行去风险行为对人道主义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有明显的影响，因为人道主义组织不得不取消某些方案的优先地位，以避免任何意外违反制裁的行为。

24. 在某些情况下，会员国会利用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对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指认，作为限制人道主义组织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例如为准入提供便利)与这些团体接触的理由，包括禁止人道主义组织进入这些团体存在和有影响力的地区。这种过度遵守包括划定针对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禁区，以及对被指认团体实行严格的禁止接触政策。

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的意外收益

25. 安全理事会第 2664(2022)号决议第 3 段要求人道主义行为体作出合理努力，尽可能减少制裁措施所禁止的任何收益，包括为此加强风险管理和尽职调查战略与程序。事实上，尽管实施了尽职措施和减少风险措施，但人道主义组织的活动可能会给受联合国制裁的实体和个人带来附带收益。例如，此类收益可来自：(a) 向联合国指认的个人或团体控制下的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支付公用事业费用或行政费用，或者缴纳税款；(b) 在联合国指认的个人或武装团体的指令下将货物或资金转移到某些机构(例如医院、基金会、事实上的行政部门和当地服务供应商)，以期通过这些机构实施人道主义方案；(c) 向易被联合国指认实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征税或敲诈的群体提供援助；(d) 求助于易被联合国指认实体和个人征税的当地承包商、供应商或汇款公司。

26. 在这些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索马里，人道主义组织在提供援助时要有能力与联合国制裁的实体和个人进行直接接触，这对尽量减少附带收益至关重要。至关重要，这样做使得人道主义组织能够阐明底线和谈判条件。有许多例子表明，人道主义组织会拒绝接受联合国制裁的行为体提出的不可接受的条件，包括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使用指定的服务提供商，以及让国际工作人员支付过高的“签证入境税”。人道主义接触经常会遏止新出现的做法，例如在检查站系统性地要求付费。

27. 实行了一些措施，以尽量减少在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过程中资金或资产可能被转用或以其他方式被挪用的风险。虽然这些措施可能会延误人道主义援助的交付，并导致费用总体增加，但它们可以作为约束手段，确保尽量减少转用风险。更多地采用数字技术和创新的援助交付方式，也正在提高实物和现金援助的远程可追溯性。例如，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为其现金和购物券援助方案实施了数字支付和新技术，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至少 15 个国家建立了支付工具跟踪应用程序，以取代人工分发卡片和身份验证。

看法、声誉和风险管理

28. 在开展联合国协调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地区实施针对某些实体和个人的联合国制裁，也会影响人们对人道主义行为体和行动的看法，从而影响这些行为体的接受度、安全性和接触所有有需要的人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据报告人道

主义行为体被视为联合国制裁措施的代理人或倡导者。有多种因素可能造成或强化这种看法，包括并非具体针对适用联合国制裁措施情况的因素，例如安全需要，这意味着人道主义行为体要与联合国维和人员或国家部队在物理上保持近距离。联合国各实体已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29. 人道主义组织有选择其执行伙伴和监测其活动的充分程序。还制定了举报和调查欺诈案件或涉嫌欺诈案件的规则和程序，包括在调查期间暂停方案的执行。这些规则和程序还规定了纠正措施，例如终止合同关系和收回未使用的赠款。

30. 人道主义机构在索马里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风险管理单位，以加强阿富汗境内的国际援助活动(包括人道主义应急行动)中的风险缓解工作。这些单位向参与人道主义活动的所有组织提供服务，包括风险管理工具、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以及促进定期信息交流。

四. 安全理事会对意外负面人道后果的应对措施

31. 针对人道主义界报告的挑战，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多年来对资产冻结措施、禁运、旅行禁令和部门限制实行针对特定制裁制度的豁免，为执行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便利。例如，安理会强调便利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决定安全理事会第 2140(201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关于也门)在认定有必要为人道主义组织工作提供便利的情况下，可以逐案豁免可能违反也门制裁制度中任何措施的活动。下文提供了针对具体制裁制度的个别制裁措施人道主义豁免的更多例子。

A. 资产冻结措施的人道主义豁免

32. 为了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不受到不当扰乱，安全理事会逐步修改了资产冻结措施的框架。2010 年，根据安理会第 1916(2010)号决议采取了有限的人道主义例外做法，以促进在索马里境内不受阻碍地及时交付人道主义援助。安理会在该决议第 4 段中强调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重要性，并谴责武装团体将人道主义援助政治化以及滥用和挪用人道主义援助。

33. 安全理事会在第 2615(2021)号决议中决定，支持阿富汗境内民众基本需求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活动并不违反资产冻结规定，并决定允许为了确保及时交付此类援助或支持此类活动而处理和支付必要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及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服务。

B. 军火禁运措施的人道主义豁免

34. 联合国制裁制度的一个常见特征是包含以下军火禁运豁免：(a) 对联合国临时出口用于个人防护的仅供联合国人员、媒体代表以及人道主义和发展工作者及相关人员个人使用的防护服，包括防弹背心和军盔(其中一些需要通知相关制裁委员会)进行长期豁免；(b) 对出口仅用于人道主义或保护用途的非致命性军事装备及相关技术援助或培训(其中一些需要通知相关制裁委员会)进行长期豁免。

35. 安全理事会于 2018 年在南苏丹实施军火禁运措施时，以及安理会在通过第 2488(2019)号决议之际对在中非共和国实施的军火禁运措施进行第一批调整时，都纳入了上述军火禁运长期豁免。

C. 旅行禁令措施的人道主义豁免

36. 针对禁止被指认人员到其国家境外旅行的旅行禁令措施确定了人道主义豁免，允许为特定目的进行旅行，包括出于医疗原因、履行宗教义务和参加司法及和平与和解进程。一些人道主义行为体表示关切的是，寻求旅行禁令豁免以允许受制裁个人过境或进入会员国领土的过程可能会造成延误，难以将在武装冲突中受伤的战斗人员紧急转移至最近的医疗设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别表示关切的是，医疗运输可能被解释为是被联合国制裁禁止的，这可能会妨碍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工作。在紧急情况下，制裁委员会一般允许事后通知，这样在满足医疗或人道主义需求时就不必获得事先批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需求是因不可抗力引起的。

D. 部门制裁的人道主义豁免

37. 为便利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展工作，安全理事会对该国制裁制度下适用的某些与运输有关的限制、出口限制和部门金融限制规定了长期豁免。安理会还授权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逐案豁免根据某些出口限制、运输限制和部门金融限制规定本来会被禁止的活动。

38. 此外，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简化了有关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展人道主义活动的请求豁免和获得授权程序，并致力于缩短决策时限，其中在紧急情况下委员会在 5 天或更短时间内作出决定。该委员会还将豁免的标准期限从 6 个月延长到 9 个月，以提高运输过程中的灵活性。

E. 安全理事会第 2664(2022)号决议中的人道主义例外做法

39.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不同委员会实施的零散人道主义豁免办法和一些人道主义措施的局限性，并考虑到针对青年党和塔利班制裁制度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豁免所带来的影响，审议了一项贯穿各领域的豁免。2022 年 12 月 9 日，安理会通过了第 2664(2022)号决议，通过在所有实施资产冻结措施的情况下确立人道主义例外做法，应对意外负面人道后果，但 1988 制裁制度除外，对于该制裁制度，第 2615(2021)号决议第 1 段仍然有效。这些例外做法允许第 2664(2022)号决议第 1 段所列相关人道主义组织及其捐助方、银行、供应商和其他机构在不违反联合国资产冻结措施的情况下付款或处理付款，并提供经济资源、货物和服务，因为这是该决议第 1 段所允许的，不再被视为违反安理会或其制裁委员会实施的资产冻结。

40. 第 2664(2022)号决议通过后，一些人道主义组织报告说，它们在受制裁实体和个人所在的一些国家更有能力按照人道主义原则高效开展行动。这些组织注意到捐助方在某些方案中有更大的灵活性，一些捐助方的风险承受能力有所提高，它们也更容易获得国际银行的金融服务，转移其行动所需的资金。一些

会员国已将人道主义豁免纳入国内法规，另一些会员国正在制定类似的立法措施。第 2664(2022)号决议的通过将有助于执行人道主义豁免，为可能受联合国制裁措施负面影响的人道主义援助交付提供便利。

五. 建议

41. 执行第 2664(2022)号决议的目的是解决人道主义行为体最经常报告的许多关切问题，这些问题都与认为转移资产可能构成违反制裁规定的实际风险和认知风险有关。该决议第 1 段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与受制裁个人和实体进行交易的广大人道主义行为体提供了保证，此类交易、资源转移和其他接触不构成违反联合国资产冻结措施的行为。不过，要确定第 2664(2022)号决议对人道主义行动的影响似乎还为时过早。根据该决议第 5 段，紧急救济协调员将在该决议通过后 11 个月内，并在其后每 12 个月，向有关制裁委员会通报该决议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人类基本需求的其他活动(条件是符合该决议规定)的影响。

42. 尽管第 2664(2022)号决议规定了人道主义例外做法，但联合国制裁以及单边和区域制裁是在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中实施的，可能继续产生意外负面人道后果。因此，人道主义行为体可能仍然面临财务障碍和业务延误，包括由于银行和私营部门过度遵守和去风险化造成的财务障碍和业务延误。鉴于联合国制裁可能导致出现这些挑战，安全理事会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人道主义例外做法的设计和范围。调整联合国制裁并以减少任何负面人道后果的方式实施制裁，仍将是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考虑到这一目标，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减轻这种意外负面后果提出了以下建议。

43. 鼓励会员国确保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并与相关制裁委员会充分合作。还鼓励会员国考虑加快采取措施，确保在其国内立法中全面执行第 2664(2022)号决议和其他现有人道主义例外做法。谨提醒会员国，决议第 2 段明确呼吁各国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供合作。

44. 鼓励会员国，包括通过对其捐助机构和私营部门(特别是银行部门)的指导和与之进行的对话，实行风险管理政策，创造有利于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行动的环境。

45. 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不妨考虑鼓励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报告实施人道主义例外做法的障碍，以补充紧急救济协调员的情况通报。

46. 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不妨考虑促进对人道主义例外做法的一致解释和适用，包括采用安理会第 2664(2022)号决议第 6 段要求的执行援助通知。